

庄子“无言之言”的言说策略与审美意蕴

侯李游美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 要: 庄子基于语言表达难以穷尽“道”之真义而提出“无言之言”的言说策略, 强调一种随性自转、自性自适、自然无心之言, 既不可执著于有形之物, 也不可执著于绝对无象。“无言之言”呈现为一种审美生存方式, 而非对语言的工具性、客观性利用; 凸现出美的言辞决不是美本身, 于创作、体验与欣赏过程中生发出鲜活的、生成性的言外之意, 才是真正实现审美活动的标志。这种特有的言意观为庄子美学造就了开放、自由、无限的话语言蕴空间, 对传统文论“言约旨远”、“无中生有”审美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关 键 词: 以言论道; “无言之言”; 言说策略; 审美意蕴; 庄子

中图分类号: B8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3)06-0073-06

An approach to *Zhuangzi's*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Tao” can't be said and its aesthetic meaning

HOU LI You-mei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8, China)

Abstract: In *Zhuangzi*, language expression can't totally express the truth of “Tao”, therefore, there is a solution of “no language of the language” to emphasize a randomly, self-satisfied, unintentionally language. The particular word and meaning theory not only brought up an open, freedom, and unlimited language meaning space, as the poetic language infinitely approach the more profound meaning space to a top state of harmonious relation between object and self, but also has the deep foundation role on the aesthetic spirit about “simple words but profoundness” and “create out of thin air” of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expressing the truth of Tao with discourse; “no language of the language”; discourse strategy; aesthetic meaning; *Zhuangzi*

关于《庄子》言论方式的特色及影响研究, 前人已出不少成果。曹顺庆在《中外比较文论史(上古时期)》^{[1]702}中认为, 老、庄的消解性话语解读模式建构了一种独特的、“无中生有”的意义生成方式和话语体系, 奠定了中国文化区别于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文化的最基本的文化基础和文论特色。徐克谦在《“道言悖论”及庄子对言说方式的怀疑、改造与创新》^[2]中提出, “道”与“言”的悖论造成了

庄子言而无待、两行以明、不谴是非这种改造与创新式的言说方式, 这使得庄子的哲学得以通往了艺术与美学之域。刁生虎在《说“不可说”——庄子的“道”“言”悖论及其超越方式》^[3]中指出, 庄子把哲学的沉思由“说什么”(“可说”还是“不可说”)而转向了“怎么说”(“思维的说”还是“诗意的说”), 使哲学言说方式从“思维的说”(“俗言”)转向“诗意的说”(“道言”)。钟华在《“言道的悖论”及其超越——〈庄子〉话语策略新探》^[4]中总结道《庄子》一书的动人魅力与过人之处, 是通过其话语方式对“言道悖论”的六种超越而彰显的。赵奎英在《“道不可言”与“境生象外”——庄子语言哲学及其对意境论的影响》^[5]中分两方面分析了道与名不可言

收稿日期: 2013 - 09 - 28

基金项目: 四川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校研字[2012]6号)

作者简介: 侯李游美(1985—), 女, 四川成都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古代文论研究。

的原因,指出庄子以“言无言”、“言象言”两条出路突破了道言之困境。张祥龙在《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增订版)》^{[6]257-260}中提出,对于老庄而言,语言是用来传送信息的手段和符号系统,又是原本的、纯显现的存在论域或发生境域。以上对庄子言论方式的把握与理解,既契合庄子道言论的基本思想,又为后来者的研究开辟了探索路径。笔者拟在阐述庄子所谓“道不可言”而又不得不言的语言表达困境的基础上,从其时间意识论出发,对庄子“无言之言”的言说策略与审美意蕴及其对中国传统文艺美学的深远影响进行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庄子以言论道的语言表达困境

庄子的道论涉及道与言的关系问题。这是其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老子与庄子在道与言的关系上观点基本一致,都认为道不可言、言不及道,道与言相离、相悖。庄子说:“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庄子·齐物论》),就“道”的认知途径而言:“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庄子·知北游》)成玄英疏:“道无声,不可以耳闻,耳闻非道也;道无色,不可以眼见,眼见非道也;道无名,不可以言说,言说非道也。”^{[7]403}庄子用“大道不称”或“不道之道”来否定道的可被言说性,即一般概念性言语(“称”、“小道”、“小名”)无法彻底表达道。庄子承认语言为言说提供便利,但又不回避语言在对世界终极表达上的局限。以言论道这一语言表达困境,源于对“道”的言说会“亏损”“道”本身这一现实。

在庄子看来,语言甚至是一种危险的东西:“言者,风波也;行者,实丧也。夫风波易以动,实丧易以危。故忿设无由,巧言偏辞。”(《庄子·人间世》)语言易于形成对“道”的遮蔽。“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庄子·齐物论》)郭象注:“各有所说,故异于吹。”^{[7]33}言具有指向某对象的特定意图,犹如“风波”,“所言者”本身变动不居,而用“言”对“所言者”进行的表达则趋于固定和僵死。

庄子认为,首先,人之语言形成于以自我为中心的环境,体现在个人从自己特定立场出发,以己

为是,以人为非,“欲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庄子·齐物论》),个人皆师其“成心”(《庄子·齐物论》)、怀“机心”(《庄子·天地》)、有“师心”(《庄子·人间世》)等,人们为争论“是”而给万物本身强加自我认知影子。其次,为达到各种特定表达目的,人为地为语言加上各种文饰。这是语言形成“遮蔽”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庄子·齐物论》)。成玄英疏曰:“荣华者,谓浮辩之辞,华美之言也。只为滞于华辩,所以蔽隐至言。”^{[7]34}人的有限、偏滞之言常使人自隐于“道”。再次,“道”本身没有分界,语言原本没有定说,没有人后天划定的封界、畛域。“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庄子·齐物论》)林希逸曰:“因人心之私有是个是字,生出许多疆域。”^{[8]34}“道”与世界源初呈现为浑成一体、包罗万有,人类为认识和把握世界,对之进行人为切割与划分,当开口发“言”时,即用言语对世间万物命名,进而作彼此、左右、长短、大小、高下等日常认知判别,以及是非、得失、善恶、美丑等一般价值判断。庄子认为,人所发之言,总有局限性,故而有“人籁”与“天籁”的区别,而“大道”,则“未始有封”(《庄子·齐物论》)且“杳然难言哉!”(《庄子·知北游》)。最后,在言论过程中,总是伴随各种勾心斗角,情绪剧烈变化的状态,一般性言论易于陷入论辩的窘境:“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庄子·齐物论》),王夫之说,“非知则言不足以繁,知有小大,而言亦随之。以闲闲陵小知而讥其隘,以间间伺大知而摘乎小而见大;以炎炎夺小言之未逮,以詹詹翹大言之无实;故言竞起以成论。”^{[9]87}总之,人为的分界、人定的规则不可避免会打上主观目的烙印,一般性语言对其所表达的事物而言,有着无论如何也无法回避的“遮蔽”。人与人之间“以言说道”其后果只能是:“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庄子·齐物论》)从“用言”与“说道”的关系看,之所以产生“道不可言”的困境在于视人为主体,视物为客体,二者是彼此相对的存在,当作为主体的人命名客体对象(万物)时,自然试图驾驭语言这一媒介,当将语言视为此种现成性存在时,“逃离”不了其工具性、

僵死性识用之途。

《庄子》一书中有许多寓言千百年来启发着人们进行哲理性思考,其中“轮扁斫轮”(《庄子·天道》)与“得意忘言”(《庄子·外物》)正体现了语言无法传达“道”之真义的困境。庄子认为语言不仅不能如实反映事物之“真”,还不能准确表达作为方法之“道”。轮扁的“斫轮”之道是“得之于手而应于心”,虽然“有数存焉”,但却是“口不能言”,可见斫轮之“道”并不能借助语言传给后来者。另外,“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这段话说明,所有言都是“道”之本身的“幽闭”之现。所谓“言道”之“言”只是通向“道”之过程的“方便之辞”,是在领略“道”之“真义”后须“忘”其僵化、固定定义的工具或手段。

以言论道的语言表达困境源于“不可说”与“不得不说”之间的矛盾。“道”的不可说,某种程度上也是“美”的“不可说”。“道”不可说意味着“道”本身超出时空之外,无法用一般性概念语言认知它;而“美”不可说同样也意味着“美”的本质逸出时间之外,不可采取形而上的言说方式,任何一种体系化的言说无法对其进行本质性的表述。因而,无论“道”还是“美”,二者作为语言符号的时间性、生成性存在,在人们体“道”或审“美”时,不可能使用一种统一的或现成的规定性利用工具,而要视体道者、审美者各自不同语境、不同时刻,所获得的属己性来体认与欣赏。

二、庄子“无言之言”的言说策略

与《庄子》所主张观点相悖的是,庄子及其后学“道出”了那“不可言”之“道”,而且一“道”就是漂漂亮亮、酣畅淋漓十余万言,并触摸到了语言言说的敏感地带,把深具魅力的韵味留给了无数后来者。庄子认为“形、色、名、声”等外在表现形式不可靠:“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庄子·天道》)而如果因此就怯于言说“道”,人们将无法交流彼此对“道”的领悟与体证。庄子对“言道”的解决策略是“无言之言”。

“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

曰言无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庄子·寓言》)还有一句话与其相呼应并补充:“道物之极,言默不足以载。”(《庄子·则阳》)这两句话说明了庄子“无言之言”解决策略的缘由:既然终极表达——道,有着“不可言”的语言表达困境,如就此表示沉默,势必走向另一个“障”道极端,因“默不足以载”(《庄子·则阳》),故而采取“无言之言”的解决途径。所谓的“无言之言”即庄子所称的“不言之辩”(《庄子·齐物论》)、“不道之道”(《庄子·齐物论》)、“不言之言”(《庄子·徐无鬼》)、“卮言”(《庄子·寓言》)。无论何种称呼,都是指“不可言”之道的一种话语表达方式,看似漫不经心、不粘不滞、无拘无束,却全部指向那“不可言”却不得不言的“道”本身。由于“道”超越一切限定性及束缚,这随性自转、自性自适的言说方式正切近“道”的本性。在庄子美学中,“无言之言”的话语阐释方式,造就了开放、自由、无限的话语意蕴空间,所谓“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庄子·齐物论》)。

“无言之言”相反于各种区分性言说,即由“言”而带来的各种纷争,如是非、彼此、有无等。道本身混沌无形,与物通而为一,诉诸于时空无始终、无边际,不能由有形、有限、有分之言界说与谈论。在本质上,“无言之言”并非让人绝对缄默,即不发声的“内言”,张隆溪在《道与逻各斯》中指出,海德格尔说“沉默并非哑然,只有在真正的言说中才可能保持沉默。要能够保持沉默,此在就必须有话要说。也即是说,此在必须掌握自己真实而丰富的开敞性。”^{[10]232}在庄子看来,人置身于与万物相融相契的本源境域中,人之情、人之语言都应随顺天地、自然,做到“致命尽情”(《庄子·天地》)。“无言之言”召唤着人,因循万物的存在及变化,在此关系中,心不再对物进行命名与区分,而是心物间的原初交流,由此照亮一切,万物自然彰显、生成其独特意义。

“无言之言”最理想的言说方式是“卮言”：“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曰言无言。”(《庄子·寓言》)郭象注:“况之于言,因物随变,唯彼之从,故曰日出。日新则尽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

尽则和也。自然有分而是非无主，无主则曼衍矣，谁能定之哉！故旷然无怀，因而任之，所以各终其天年。”^{[7]494-495}成玄英疏：“卮，酒器也。曼衍，无心也。卮满则倾，卮空则仰，空满任物，倾仰随人。无心之言，则卮言也，是以不言，言而无系倾仰，乃合于自然之分也。随日新之变转，合自然之倪分，故能因循万有，接物无心，所以穷造化之天年、极生涯之遐寿也。”^{[7]494-495}林希逸曰：“曼衍者，游衍自得也。以无言之言则归于一理。”^{[8]433}这种“无言之言”合于自然分际，要求参与者拥有大开放与大豁达的心灵及胸怀，看似人言说，实则是自然或万物本身在言说，更是“道”在言说，人替自然发声而已，所谓“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庄子·齐物论》）可见，“无言之言”属于一种无界定性、区分性、评判性的混沌之言，呈现为自然的无心之言，完全的沉默及绝对的言说都无以呈现事物的本然存在价值，只有其在“无言之言”的衬托下，才能焕发出无限光辉。

“无言之言”可使言说顺应世间万物复杂多样、变幻无穷的存在情态，其能超越以言论道的困境，就在于其属己独特而又多义；自性自足而又开放；现实而又生成；显明而又朦胧，超越一般性认知语言那种干瘪、僵死、固定的话语言说方式。在《庄子》这一文本中，常有无尽时空、生之无涯等表述，这些都是“道”之境域下的本根存在方式，如：“游于大莫之国”（《庄子·山木》）、“游于无极之野”（《庄子·在宥》）、“游于六合之外”（《庄子·徐无鬼》）、“游于无何有之乡”（《庄子·山木》）、“游乎无有”（《庄子·应帝王》）等，这些关于“无”的意义所指，意谓一种游于“道之境域”而建构的独有精神和意义空间，其根本特征在于无、虚、空。庄子认为，只有这些存在样式才能为精神提供寓居之所，为意识所自在遨游，如苏轼所说的“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苏轼《送参寥(禅)师》），从这个角度讲，无、虚、空不仅是佛家用语，同样也是典型的道家语言。

须注意的是，道本身之无限不代表绝对“空”，“无言之言”既不可执著于有形之物，也不可只执著于绝对无象，“可言”也好，“不可言”也好，都限于物之一隅，言论不周遍终日言说的只是“物”。

道中有物，物中存道，道与人通而为一，“无言之言”的不二法门即用心体会，可见，“体道”表现为“可意会”，“可意会”回复到这一循环论的开头——“无言之言”的可行性问题。庄子“可意会”的言意观体现在：“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庄子·秋水》）成玄英疏：“夫可以言辩论说者，有物之粗法也；可以心意致得者，有物之精强也；而神口所不能言，圣心所不能察者，妙理也。”^{[7]311}思维能够言说外显的粗象，意识也能企及内在的精核，二者落于“精粗”说明还限于有形之物中，对于“不期精粗”的“道”而言，由于超出人们直接经验感知限度及一般思维认知范围，即使任何精妙语言都会使其显得苍白无力，故对于言意所不能察致的“万物之所由”（《庄子·齐物论》），“可意会”的“无言之言”才能切中其实质，寄寓于真正的无限之中，故而，庄子极力反对“有为之言”及“有为之行”。

关于“言道”的具体操作与对待沉默的态度，庄子作了详细论述：“言而足，则终日言而尽道；言而不足，则终日言而尽物。道物之极，言默不足以载；非言非默，议有所极。”（《庄子·则阳》）道与物的关系实则是时间与存在物的关系，时间之“道”无本无末，无穷无止，但关于物的客观言说却有始有终，自然会出现“有为”、“无为”的不同态度及主张。庄子认为，无论何种作为，终究不足以“尽道”，充其量只能“尽物”，因为终极意义上的时间与存在本身，都不是“言”或“默”所能表达清楚的，“非言非默”才能表达“道”本身。有人以为能借言表达道或保持沉默，皆源于主观上的想法，庄子称其为“嗜欲深者”（《庄子·大宗师》），在否定人的主观意志后，他认为方能悟道、体道。

庄子“无言之言”其最高境界通过以下两句话可得到明显体现：“目击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声矣。”（《庄子·田子方》）“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知北游》）钟华指出，这种“‘言’而又‘之于天’；‘言’而又‘不落言筌’，成功地化解了逻辑工具性语言必然遭致的‘言道的悖论’，既言说了‘大道’又避免了‘人之说’的褊狭与言障，成为了真正的名

副其实的‘体道真言’。”^[4]可见，欲达于空寂玄妙之境，庄子客观上开创的这种独特言意观，体现了道物一气、物我相融之至境。

三、庄子“无言之言”的审美意蕴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庄子·知北游》）“无言之言”具有深厚的审美意蕴，从时间维度考察“道”与“美”，可知其时间性存在拒绝任何现成化言说，凡是概念式、抽象式、逻辑式的言说与表达都脱离于时间意识之外。如果运用逻辑性的工具化语言言说，其必然是僵死化的现成性存在，丢弃了语言本身的鲜活性，无从展露美之为美的全部魅力。庄子认为，只有借助“卮言”这种诉诸时间意识的言说方式（“无言之言”的最佳表达），才有可能展现“道”或“美”的真义。这种言意观，反证了庄子所处时代人们的现实生存困境，揭示了语言表达的尴尬局面（自语言诞生就有的困境）。而且，言本身并不是意，它只能对意的形成与理解起到暗示和象征作用，所以就有了庄子所谓的“得意忘言”：“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庄子·外物》）通过把握语言可表达层面，获得比这一表达层（言）更多的言外之意，通过言内所及的在场存在，显现出或言说着“隐蔽”在背后的无尽意义。对艺术文本而言，语言表达的局限性正好丰富了观赏者感受、体悟的审美意蕴。这种由旷达开放胸怀而出的“无言之言”的表达方式，深刻地影响了历代文艺理论，甚至渗透到审美活动的各个角落。

一方面，“无言之言”呈现为一种审美生存方式，而非对语言的工具性、客观性利用。在时间生成意识下，个体生命自由、人生极境下的精神超越与这种特殊性的语言存在相联系，自然、自动地实现了对一般性认知与世俗功利判断的超越，从而具有浓厚的审美意味。庄子主张的是一种艺术化、审美化的存在，其语言的主体并不局限于人本身，而是扩展到天地、万物，甚至无所不在的“道”本身。在逍遥、自在的境界中体会、领悟天地之“大美”，“道”之澄明。语言作为人之存在的体验，是一种生命对

美的体验，其间人沉浸在深深的自足、自适之中。在语言层面上，“无言之言”没有被外在标准所分化，它能弥合人与言之间的分离，在审美层面上，它特别强调人与物在“齐一”状态中，体会鲜活、生成之“意”，感触一切存在，体“悟”所谓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特别是体会“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丰富审美意蕴。另外，庄子承认并尊重人之多样性存在，既然都极力在意识与行为上与“真人”靠近，须“体道”，那么“体道”的过程因人而异，这又是其阐释意蕴的丰富性之体现。陶渊明所谓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即审美主体感觉、把握到了审美意蕴，但这种审美意蕴诉诸语言难以淋漓尽致表达，因此寄寓于“无言之言”这样一种近乎于神秘的审美体验与审美表达。司空图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更是强调超越语言的工具性，用“少言”，甚至“不言”的方式，造成文字上的朦胧空白，使人感觉言已尽而意无穷，深受其影响的艺术家们把语言及其他具象符号作为表达的手段，作为通向更深层审美意蕴的桥梁。

另一方面，“无言之言”凸现出美的言辞决不是美本身，更不是审美目的之所在，而只是媒介或手段，于创作、体验与欣赏过程中生发出鲜活的、生成性的言外之意，才是真正实现审美活动的标志。虽然传统文艺创作观认为文学内容需要语言承载，思想需要语言宣扬，但语言表达之于“意”而言，有着“不可言”之困境。作者如能将目光放在语言（实境）之外的流动性、生成性之虚境，用“留白”、“无声胜有声”这类“无言之言”的表达方式，引导人感受并把握那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蕴，就能让人神会艺术形象的深层内涵。中国古代有众多作家及文论家对此颇有心得，阮籍诗“言在耳目之外，情寄八荒之表”，刘勰倡导“义生文外”，钟嵘提出“言有尽而意有余”、严羽要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言已尽而意无穷”，皎然崇尚“但见性情，不睹文字”，都可从其中找出庄子思想的影子。在此意义上，徐复观认为：“老庄思想才是中国的艺术精神，庄子所追求的道，与一个艺术家所呈现的最高的艺术精神，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11]49}而在文艺欣赏与体验上，审美接受者从语言及具象感受与把握文本，但又不绝对拘泥于语言和具象本

身,而是努力挖掘言语之外的空白部分。海德格尔说,“话语的另一种可能性即沉默也有其生存论基础。比起口若悬河的人来,沉默的人可能更本真地‘让人领会’,也就是说,更本真地形成领会。”^[12]¹⁹²可见,语词本身之外存在着无限丰富的意义,言中意只是其表层含义,言外意或“不言”处才是挖掘不尽的意义宝藏。苏轼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评司空图,说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引梅尧臣的话,“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可见,文学欣赏的魅力就在于让审美者发掘咸酸之外的美,体会“不尽之意”、“言外之意”、“韵外之致”。

综上所述,在生成性时间意识下,为解决以言论道的语言表达困境,庄子在“体道”基础上而提出“无言之言”之言说策略。这种独特而有意蕴的言意观,意味着用诗性语言向更深邃的意义空间无限靠近,使得人对于审美意义的把握有着无限阐释的余地,同时,作为一种揭示了审美创造与审美欣赏的内在特殊定律,不断启发后人按此线索进行探讨与追求。庄子的“无言之言”作为中国审美精神的核心,对中国人特有的审美心灵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塑型作用,对中国传统文论“言约旨远”、“无中生有”这类审美追求与审美内涵塑造,起到了深

刻的奠基作用。

参考文献:

- [1] 曹顺庆. 中外比较文论史(上古时期)[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
- [2] 徐克谦. “道言悖论”及庄子对言说方式的怀疑、改造与创新[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4): 21-26.
- [3] 刁生虎. 说“不可说”——庄子的“道”“言”悖论及其超越方式[J]. 兰州学刊, 2004(4): 182-183.
- [4] 钟华. “言道的悖论”及其超越——《庄子》话语策略新探[J]. 学术月刊, 2006(10): 95-101.
- [5] 赵奎英. “道不可言”与“境生象外”——庄子语言哲学及其对意境论的影响[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2007(3): 15-21.
- [6] 张祥龙. 从现象学到孔夫子: 增订版[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 [7] 郭象, 成玄英. 庄子注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8] 林希逸. 庄子鬳斋口义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9] 王夫之. 老子衍·庄子通·庄子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10] 张隆溪. 道与逻各斯[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 [11] 徐复观. 中国艺术精神[M].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7.
- [12]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上海: 三联书店, 2006.

责任编辑: 曾凡盛